

一张珍贵的照片

◆ 郑清心

我家是《新民晚报》的老订户。2017 年 11 月 28 日傍晚,像往常一样,我从信箱里取出刚送来的报纸边走边翻。突然,第 16 版上的一条副标题让我一怔:“红墙摄影师”侯波逝世。啊!侯波老师!我惊住了,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摄影家,我们家就藏有一张她在 50 多年前拍摄的照片。

并不如烟的往事

那是 1960 年 3 月 19 日,一个春雨潇潇的下午。杨浦区飞虹路上的上海工具厂里,我先生的父亲朱富林,正在车间里紧张地工作。一个神秘的电话打来,父亲连工作服都没来得及及换,乘上一辆前来接他的小轿车就走了。轿车把父亲带到康平路,那里已有其他厂来的四个工人等着,他们又一起被带到了

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当大家走进一间大客厅的时候,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沙发上坐着的竟是毛主席!

毛主席满面笑容地握住了父亲的手,父亲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时守在一旁的侯波老师“咔嚓”一声,留下了这一难忘的瞬间。

让父亲意想不到的毛主席接下来对他说的话:你是革新闯将,上海工业战线也出了个“朱总司令”,太好了!这一番话,让父亲更加激动得不知所措。

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原来就在这天早上,上海《解放日报》的头版在“心红胆大智多手巧/攻下科学技术尖端”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父亲的照片和上海工具厂研制成功第一流小刀具的报道。毛主席已经看到了这篇报道,他关切地问父亲,搞试验有没有困难?父亲说没什么困难。毛主席说:“不见得吧!困难肯定是有。”又问父亲搞了多少次试验才成功?父亲回答说 228 次。毛主席说:“是嘛!你们上海有个王林鹤,发明高压电桥不是经过了 300 多次试验吗?困难是不小的,但是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要怕困难!”父亲听了连连点头。

这天晚上,毛主席请父亲和另四位上海工人代表一起吃饭,晚饭过后,又请大家一起去小礼堂看京戏。离开那里已经很晚了,父亲很想知道自己刚刚是在一个什么地方,便谢绝了送他回家的小车司机,一个人在附近转了一圈,才明白,刚才是在锦江饭店。

父亲回到家已是半夜,母亲跟往常一样起床给他热饭菜,父亲说他已吃过了,母亲问在哪吃的?父亲说毛主席请我吃的。母亲说,忙昏头了,瞎话三千。父亲怕再说下去要漏嘴,赶紧说关灯睡觉!遵照当时的保密条例,三天之后,父亲才向工具厂领导汇报了 19 日那天见到毛主席的前后经过。

照片背后的故事

父亲为什么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还得到赞扬?这个要从父亲不畏艰难大搞技术革新说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刚刚起步,上海的工业战线的工人们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很快就生产出了第一块国产手表、第一台国产照相机、第一台电视机……然而在这些辉煌的背后却有着难言之隐:当时由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加工出这些“第一”的钻头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父亲每次去上海手表厂联系工作,临别时手表厂的同志总是要问上一句:朱师傅,我们啥时候能用上自己的钻头呀?

要打破垄断,要长中国人的志气,父亲倍感责任重大。身为小刀具工段长的他决定迎

难而上。他主动向厂领导请缨,挑起了试制微型刀具的重任。1959 年的冬天,在工具车间的小阁楼上,三台小车床,一张钳桌台,一架万能工具显微镜,父亲和他的技术攻关小组开始了微型刀具的试制。在全厂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只用两个月的时间,直径 0.4 毫米的小钻头首先试制成功,他们立马又转入了直径 0.08 毫米小钻头的研制。0.08 毫米,就是一根头发丝的粗细,还要在上面铣上两条曲线槽,在端口开上各种几何形状的刃口,难度是极高极高的。这是一场真正的硬仗。厂里的机床的精密度不够,他们就自己动手改造。机床的防震出现了问题,无法正常工作,父亲想想啊,想起小时候在河边扔石子玩,河面上会产生出的圈圈涟漪,这里面的道理,是不是能拿来用?父亲就用改变机床皮带转向的方法进行实验,终于降低了机床的震动。而在把比火柴梗还细的高速钢磨到比绣花针还细的过程中,父亲居然用上了农民搓草绳的原理,顺利地解决了高速钢弯曲和打滑的难题。

就这样,五天五夜不离岗,历经 228 次试验,技术攻关小组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直径 0.08 毫米的小钻头,填补了我国工具制造业的空白。小钻头立即被送到了北京工业展览会的现场,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获得成功的父亲还不停歇,他与厂里的技术人员一起设计改进,一口气搞出了十三台机床,在满足微型刀具批量生产的同时,还培养出了一批青年技术工人。因为在技术革新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父亲连续三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被誉为上海的“小钻头大王”。1960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提拔一批工人工程师的决定,在 138 人的名单中,父亲名列机械工业局的榜首。

失而复得喜欲狂

那年毛主席离开上海不久,父亲就收到了上海市总工会寄来的他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欣喜之余,父亲却发现照片上有一条折痕,正好在毛主席的头部。出于一个工人对伟大领袖的敬仰,父亲赶紧把照片交还给总工会,希望重新换一张。没想到这照片一去便石沉大海 30 多年,成了父亲心中一个最大的遗憾。

父亲是一个朴实的工人,对党和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父亲的身世很坎坷,从小失去双亲,是哥哥嫂嫂把他拉扯长大,16 岁那年,他独自一人夹着一个小包袱,沿着沪杭铁路,从嘉善一路走到上海来学铜匠。父亲没文化,但是他勤奋,拼命地跟师傅学技术,才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1950 年,父亲进入了上海工具厂,从此有了稳定的工作,强烈的翻身感激发起父亲的工作干劲。他白天在车间干活,晚上到夜校补习文化,很快就入了党,当上了工段长。1956 年春天,车间主任问父亲想不想住新楼房,父亲以为是开玩笑,就顺口说了声好的呀。没想到几天以后,车间主任真的给父亲送来了一把钥匙,一家老小从此告别“蜗居”,搬进了刚刚建成的凤城新村。组织的关心,生活的改善,让父亲倍感温暖,他要加倍努力地工作,



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我先生告诉我,他们小时候难得见父亲一面,早晨醒来,父亲已经上班去了,晚上要睡了,父亲还没回来,连星期天也不休息,经常去厂里

加班。被提拔为工程师之后,父亲就更加忙了,去重庆帮助筹建重庆工具厂,去阿尔巴尼亚援建科尔察工具厂,1978 年还光荣地代表上海工业战线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科技大会。

1993 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上海市总工会的同志辗转找到了父亲和另四位当年一起被毛主席宴请的工人代表。已经退休了十多年的父亲好激动好高兴,在参加完市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之后,他向有关同志说出了埋藏在心中三十多年的遗憾。总工会很快就寄来了照片,我们从未见过父亲那个高兴劲。33 年了,失而复得,他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心愿,我们也第一次看到了父亲与毛主席的这张合影。我和我先生特意请了一位照相馆的特级技师,将总工会寄来的 7 寸照片翻拍放大,配上镜框,挂在了父亲卧室的墙上。年逾古稀的父亲非常非常高兴,便把那张 7 寸的照片送给我们保存。

1999 年,上海工具厂举行五十周年厂庆,父亲与毛主席合影的这张照片被放大到比一个人还高,挂在纪念大会礼堂入口处。父亲在纪念大会上向全厂职工在回顾了当年成功研制出微型刀具的经过后说:“在 120 多个小时内,我们试制组的同志没有合过眼,没有休息过,日日夜夜搞试制,摸索经验,那是本着为国家填补刀具空白的意愿,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为国庆 10 周年献礼决心!”

从遗物读懂父亲

但说句老实话,父亲为国家做出过那么大的贡献,当年我的婆婆和我先生他们兄弟姐妹却知之甚少,因为父亲非常低调,从不在人前夸耀自己。当年我嫁进门时,只以为我的公公是个很朴实的老工人,不知道他原来是这么的伟大!直到 1993 年之后,我们才慢慢知晓三十多年前的那些令人敬佩的往事。2007 年 5 月,父亲不幸因病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他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 1960 年 3 月 19 日的《解放日报》,看到了他在 1963 年上海市工业交通方面五好集体和职工代表大会以及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稿,还有他保存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上海党史》等书刊,那里头真实地记录了当年毛主席宴请五位上海工人代表的经过……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这是一个老工人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最好见证。

父亲就像一本教科书,封面装帧相当简单,但里头的内容却极为丰富。我们从父亲留下的那些文件资料中,慢慢地读懂了父亲,开始真正理解父亲。我们钦佩父亲,我们怀念父亲!我们想选择最合适的方式来祭奠父亲,为此给《新民晚报》写了一封信。晚报的资深记者钱勤发老师很快就联系上了我们,2007 年 10 月 30 日,《新民晚报》发表了钱老师撰写的文章:《一个老劳模最珍贵的一天》。

是的,父亲他们那代人,是新中国工业建设起步阶段的顶梁柱,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不畏艰难,刻苦钻研,这不就是“工匠精神”吗?而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科学技术研究创新更需提速的今天,老一辈劳动者埋头苦干的精神,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看到“夜光杯”上一组“流光小物件”的十日谈,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停课年代,闲得无聊,又找不到可读的书,于是,对缝纫发生了兴趣。缝纫服装先得裁剪,学裁剪没有师傅教,就找裁剪书来学。好不容易从一位同学处借来一本裁剪书,“如饥似渴”地把这本书前前后后翻了一遍又一遍。幸好学过机械制图,服装裁剪图倒也不难看懂,先拿张报纸替代布料,就这么比比划划,居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依样画葫芦式的裁剪。

借来的书总得还呀!跑遍上海的新华书店又根本买不到。怎么办呢?自己动手抄!凭借自己机械制图的功力,一张一张地把整本裁剪书中的图纸画了下来,还有那附加的裁剪指南文字资料也一并抄录了一遍,花费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本宝贵的裁剪书至今仍保存在我的大书橱里,毕竟凝聚了我的不少心血呢!

接下来,就是要置办一架缝纫机了。那年代,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可都是凭票供应的。按照母亲单位票证排队的次序,母亲要想拿到缝纫机券至少要等十年,那不是“黄花菜都凉了”吗?幸亏母亲人缘好,也特别好说话,肯帮人忙,因此落下一个极好的口碑。所以这次母亲跟工会主席说了,居然破例提前发了一张缝纫机券。为此,我兴奋了好几天。

可是,买一架缝纫机整机需要一百五十元左右。我和弟弟拿着缝纫机券和父母好不容易凑齐的一百元钱,在店堂里转了半天,傍晚时分还是怏怏地空着手回到家中。晚饭后,我和弟弟愁眉苦脸地坐在床沿。突然,已在房修队木工班做徒工的弟弟一拍大腿说,有了。我忙问他有啥好办法。他说,白天在缝纫机商店看到有单独卖缝纫机机头的,大概七十六元,边上还有卖次品缝纫机铸铁机架的,最便宜的只要十五元,两样加起来才九十一元,至于缝纫机台板我们可以自己做呀,成本也就几元钱,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听完弟弟的一番话,我高兴得把弟弟抱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等商店开门,买了蝴蝶牌的缝纫机机头,又挑了一副铸铁机架。我拿出纸笔和尺子,把缝纫机台板的尺寸仔仔细细地量了又量,画在纸上。

就这样,仅仅花了不到一百元,我家终于有了一架漂亮而又实用的蝴蝶牌缝纫机。为了表彰弟弟的功劳,我决定有了缝纫机之后的第一件衣服就给弟弟做一件两用衫。在八仙桥的布店里,我买到一块藏青色的零头布,正合适做一件两用衫,零头布可以节省半尺布票和半尺料子的钱呢!量了弟弟的身材尺寸,翻开我那本自己绘制的裁剪书,很快就将两用衫裁好了。花一毛五分钱,到服务站“拷边”,这样缝起来才正宗呀!

不怕你笑话,其实我从来没有踏过缝纫机,刚开始时手忙脚乱不说,缝纫机还特别不听使唤,一不小心就自说自话地来一个“倒车”,断线、缠线,搞得一团糟。没办法,我只得左手掌握布料的推进,右手摸着缝纫机头右侧的飞轮,唯恐发生倒车。战战兢兢,好不容易把弟弟的两用衫完工了。看着我的“杰作”穿在弟弟的身上,兄弟俩开心地笑了。

如今,我已年届古稀,弟弟也早过花甲之年,这架不平凡的蝴蝶牌缝纫机依然完好无损地摆放在客厅显著的位置上。偶尔,它还能发挥余热,会为家里的缝缝补补贡献力量呢!

当年自制缝纫机

◆ 杨保飞